

# 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及其薪津状况考析

杜丽红

**内容提要:**受地缘政治和疫情影响,东北地区是清末中国卫生行政创立的前沿,不仅早在1870年左右就聘用了英国医生出任海关医官,而且在1899年开始聘用西医出任营口卫生局官员。文章利用清末东北官聘西医的档案资料,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压迫。直到新政官制改革,奉天开始聘请中外西医出任新设立的卫生机构和医院的官职,并支付相对较高的薪资。在东北大鼠疫期间,为了应对严重的疫情,东北官府除在天津、上海、广东、北京等地聘请中外医生外,还在东北各地聘请日本医生参与防疫。这些西医不仅领取较高的薪资,而且约定了相当数额的抚恤金。为此,清政府特别制定抚恤金的等级标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对西医资格的认定标准。最后,文章认为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对中西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官聘西医 薪津 西医评定标准

一直以来学界对清代官员的薪俸研究较少,其原因诚如黎泽济所言,“清代官吏薪俸收入,可以说是于史无征的”,<sup>①</sup>只有一些零星的记载见诸于日记、书信、笔记或回忆录中,很难展开深入的讨论。<sup>②</sup>幸运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处于清末中国卫生行政创立前沿的东北地区,留下一些官聘西医的细节史料,为我们了解其薪俸状况提供了可能。此外,这些史料对于近代中国医疗史研究而言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官府聘请西医出任医官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在行政层面信任西医的态度。本文尝试利用这些资料,既从卫生制度创立视角阐释东北官聘西医的源起和薪资水平,也从东北防疫的实践过程考证官聘西医薪津状况以及官府对西医资格的认定标准,从而总结出东北官聘西医的一些特点,进而揭示出政府聘用西医出任卫生官职的取向及其意义。

## 一、东北官聘西医的源起

行文之始,需对什么是“官聘西医”做一简要说明。作为一种聘用关系,它实际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政府设立了与医疗卫生相关的职位,且需由医生任职;二是政府聘用受过西式医学教育的医生出任相关职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文章将从政府为何设立医疗卫生岗位讨论官聘西医的源起,进而简要分析他们的薪津状况。

近代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来华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专门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亦进入中国。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他们在中国开始按照西式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医生。随着西医人数的增加,医生的中西之分日渐明显。西医成为一个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不仅受到官府的聘

[作者简介] 杜丽红,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教授,珠海,52900,邮箱:lzdhh@sina.com。

① 黎泽济:《晚清官吏薪俸收入概况》,《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② 刘晖:《清末京官俸制改革探析》,《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李志茗:《清代官俸制度及其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任,而且渐成代表科学和进步的职业。<sup>①</sup>这一历史过程漫长且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色彩,对东北而言,官聘西医则完全是列强压迫的结果。东北地区最早的官聘西医是山海关税务司的海关医官。咸丰十一年(1861)牛庄开埠后,设立山海关税务司,归海关总税务司管理。同治二年(1863),赫德创办了海关医疗勤务,在各关派驻一名医官,负责照顾居留地的外国人与停泊船只船员的健康,以及观察、记录港埠的卫生状况。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一,港务长托斯·爱得金公布由山海关副税务司赫政制订的《牛庄口港口章程》,规定营口港对进出口船舶实施检疫。<sup>②</sup>此后,山海关税务司雇佣西方医生出任海关医官,办理卫生医疗的相关事务。清末十余年间,山海关医官一直由毕业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英国医生代徕(Burgh Daly)担任。<sup>③</sup>

19世纪末,东北地缘政治巨变,日俄两国分别派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卫生防疫成为两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对于来自两国的威胁,地方政府被迫建立相应机构,聘请西医办理卫生行政。尤其在营口,光绪二十五年(1899)鼠疫期间,各国通过外交压力强迫山海关道开办卫生局,随后日俄两国在军事占领期间也分别下设卫生局,日本在光绪三十二年交还营口给中国政府时,特别在《交收营口条款》第三条中规定按照日本人要求办理卫生事务。此后,营口警察局只聘请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西医出任医官,“薪津自一百两以至二百两不等”。<sup>④</sup>

日俄战争后,在内外因素影响之下,除营口外,东北官府开始聘请西医出任新设的卫生行政职位。从内因来看,1905年东北开始自上而下的官制改革,在奉天创设了卫生行政和卫生医院,需要聘请医生出任相关职位。在列强的压力下,官府不得不聘请西医办理卫生行政和主持医院事务。从外因看,日俄两国在东北的存在,迫使地方官吏不得不认真办理卫生行政。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取得南满铁路沿线的铁路附属地的管理权,积极建设,常以卫生防疫为借口,试图干涉相邻中国城镇的管理。这使得各地官员有“况当客军在境,若不自行整顿,势将越俎代谋”之紧迫感。<sup>⑤</sup>为避免引起日本人的干涉,清政府不得不重视卫生医学事务,诚如赵尔巽所言:“奉省经日俄战后,日人凭籍铁道分布势力于全省,而租界警权尚未议决,关于地方行政之事,动思越权相争,如营口、盖平之派日员防疫,省城设警察派出所”,“决非空言所能抵制者也”。<sup>⑥</sup>

综上所述,清末东北的官聘西医有三种来源:一是海关税务司聘用的海关医官;一是营口地方在防疫过程中被列强逼迫雇佣的西医;一是因应官制改革且受日俄压力雇佣的西医。那么,这些官聘西医的状况如何呢?目前笔者仅找到了第三种官聘西医的资料,下面围绕这些材料进行简要分析,以图描述出东北官聘西医的大致情形。

## 二、奉天官聘西医的薪津概况

光绪三十一年,东北官制改革,聘请西医出任创设的医官职位。是年二月,盛京将军增琪奏准创

① 近代西医在华发展问题受到一定关注,参见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尹倩《近代中国西医群体的产生与发展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何小莲《略论近代上海西医的社会地位》,《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② 营口海关编印:《营口海关志》,2002年印刷,第218页。

③ 需说明的是,目前对山海关医官的了解主要来自海关出版发行的 *Medical Report*。笔者将在未来研究中继续探讨有关海关医官的问题。

④ 宣统二年(1910),该局聘请的4名医生分别是:毕业于日本熊本医学专门学校的郭钟韶、毕业于北洋高等官医学堂的邓松年、毕业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英国医官达利(De Burgh Daly,时任牛庄海关医官),以及毕业于日本熊本医学院的日本医官内田镇一。《营口周道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26。另有资料显示,内田镇一于1918年11月续聘为营口警察厅卫生医官,月薪为营平银200两。《营口警察厅续聘卫生医官日员内田镇一合同清查由》(1918年11月23日)，“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档号03-01-020-05-001。

⑤ 《户部咨开奉天巡警、警察卫生所支各款仍在铺捐、灯膏等款动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268。

⑥ 《奉天巡警、卫生及警务学堂三处支款不敷由》(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268。

办奉天官立卫生医院。二月十七日,增祺致函直隶总督袁世凯,请其遴派熟悉警务及卫生的官员前往奉天。袁世凯指令赵秉钧、北洋陆军军医局道员徐华清和北洋卫生局知府屈永秋迅速办理。这些官员表示“北洋医员无多,又值军队日增,所有医官人等业已不敷分派”,仅在北洋官员中选派“医学精良,公事谙练,于卫生事宜尤为熟悉”的候选通判汤富礼、候选县丞王恩诏和候选县丞姚启元3人,前往东北办理卫生事务。北洋方面要求增祺为他们提供每月250两的薪津,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医生在天津的“薪费俱在百金以上”;二是因为“东省事体甚繁,而且百物腾贵,费用较巨”,如果薪水不从优,“恐不足以资用度”。增祺接受北洋大臣的建议,同意为3位医官提供200两月薪外加50两津贴,汤富礼出任卫生医院提调医官,王恩诏和姚启元充任医院医官。三月十四日,3位出身北洋的西医携带药物和人员到东北上任。<sup>①</sup>

那么,这3位医生的薪津大概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下面用比较的方法予以说明。首先,与同期赴奉的其他医务人员的月薪相比较,医生的薪津是他们的5—10倍,绝对处于非常高的水准。盛京将军为随医生而来的其他人员开出的薪水分别是:司药50两,文案60两,卫生巡捕长24两,卫生巡捕20两。<sup>②</sup>其次,较之同期北洋赴奉的其他官员,3位医官的月薪处于中上水平,介于交涉局总办与警察总办之间。北洋派往东北协办新政的其他3位官员的薪水分别是:直隶候补道钱镛,出任交涉局总办并兼办学务处事宜,月支银300两;江苏候补知府冯国勋,出任警察局总办,月支银200两;学生富士英,任警察局帮办,月支银100两。最后,与奉天警察局官员的薪俸相比较,医生的薪津介于总办与提调之间。巡警局官员的收入包括薪水和津贴两部分,总办每月薪津收入400两,提调每月薪津收入200两。<sup>③</sup>由上可知,东北为聘请北洋的医生开出了高薪。当然,按照东北官场的惯例,官员们的收入除薪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灰色收入,不能简单将薪津视作其实际收入。本文只讨论了国家为官员支付的薪津,并未涉及其他收入。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赵尔巽以“卫生一事于人民治安极有关系,故与警察互相表里,可合而不可分”为由,下令奉天卫生局与警察局合并,聘请西医出任巡警总局卫生科官员和卫生医院的医生。<sup>④</sup>警察局先后聘请中、日两国西医出任卫生科官员。光绪三十三年初,卫生科每月实支薪津2035两,大大超出额定数1240两。造成超支的原因在于,卫生科雇佣的4名日本医生和1名中国医生的薪津是额定数的2—3倍。具体情况如下:防疫股股长志雄月薪300两,额定数为80两;分析股股员桥之太次郎和迟木郁男月薪150两,额定数为60两;医务股股员杉本浩二月薪179两,额定数为60两;医务股股长姚启元月薪250两,额定数为120两。<sup>⑤</sup>

此外,赵尔巽计划建立一所可“驾凌当地各国所设医院”的卫生医院。<sup>⑥</sup>该院由巡警总局卫生科管理,聘请来自日本、德国、英国和中国的医生。<sup>⑦</sup>最初,该院雇有6名医生:英国医生1名,每月薪膳银500两;德国医生2名,薪膳银分别为600两和460两;日本医生3名,每人薪膳银216两;中国医生3名,每人薪膳银250两。此外,该院为医生配备的译员和助手的月薪共计940两。<sup>⑧</sup>到宣统二

① 《酌拟调派医官暨随带执事人等薪水数目分别缮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97。

② 《酌拟调派医官暨随带执事人等薪水数目分别缮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97。

③ 《附巡警总局常年经费各项预算表》,徐世昌编纂:《东三省政略》(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941页。

④ 《奉天警察总局谨将拟办卫生章程二十四条缮具清折恭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268。

⑤ 《奉天警察总局各科各股人员额定薪津银数》《奉天警察总局各科各股现支薪津数目》(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268。

⑥ 《奉天巡警、卫生及警务学堂三处支款不敷由》(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268。

⑦ 《纪卫生医院》,徐世昌编纂:《东三省政略》(上),第957页。

⑧ 《卫生医院及防疫病院、医学堂、兽医学堂预算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268。

年,该院仍聘有日医3人,德医1人。<sup>①</sup>与此同时,奉天警察学堂聘请日本医生担任医学教习,月薪300日元(约合227两)。<sup>②</sup>

概而言之,奉天巡警总局卫生科和卫生医院聘用的医生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们都是接受过西式医学教育的医生;二是官聘西医来源多元,中国西医基本是来自北洋的医官,其他则来自日本、德国和英国,以日本医生居多;三是这些西医均为官府高薪聘请,月薪在200—600两之间。虽然官聘西医月薪整体水平较高,但各国医生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日医生的月薪基本持平,大概在200两左右,英国和德国的薪水较高,大概是中日医生的2—3倍。

那么,东北官聘西医为何薪津较高呢?笔者以为,这既反映出东北地区的特殊性,也体现了当时西医的市场价格。新政改革后的历任东北大员,积极办理新政,愿意聘用新式人才出任相关职位。他们藉着新设省制、新设局所兼行新政之便,广设局所,优给薪俸。<sup>③</sup>再加上东北地处边陲,环境恶劣,物价昂贵,又缺少接受过西式医学教育的医生,只好从北洋咨调,或借才异地,“尤非优给薪津,不足以示羁縻,而收实效”。<sup>④</sup>

从市场供求状况来看,官府必须提供高薪才能聘请到合格的西医。当时,整个中国受过西式医学教育的医生极少,不仅难以满足城市发展和人口聚集所引发的社会需求,更难满足国家卫生建设对西医的需求。<sup>⑤</sup>清末,各地官聘西医的薪津都不低,北洋医学堂毕业生一般月薪为60两,<sup>⑥</sup>两江总督辖下正军医官月支薪水为100两,<sup>⑦</sup>山东中西医院及高等学堂正医官月薪为200两。<sup>⑧</sup>事实上,西医作为一种稀缺人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为满足需求官府不得不聘请外国医生任职。然而,外国医生必须比照其本国的薪资水平。在英国,医生属于高收入者,<sup>⑨</sup>必须高薪才可聘其出任政府职位。光绪三十四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聘请英国医生斯坦利继续担任卫生官,开出了800两月薪的条件。<sup>⑩</sup>1909年春天,教会开设的奉天医学院拟聘请英国医生,其薪资标准“基本上比照英国人从中国铁路、邮局和海关所得到的工资。”<sup>⑪</sup>当时中国铁路聘请英国总工程师月薪为800—1500银元(约合520—975两),副工程师为600—1000银元(约合390—650两)。<sup>⑫</sup>据此推算,该院聘请医生的月薪大概在四五百两之间。由上可知,清末西医在中国属于高收入阶层,官府要聘请西医就必须

① 《附录张师嘯圃来函》,《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5期。

② 文中银两与日元的比价按照1:1.32计算。参照《六十年来海关两与各国货币比价表》,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4号(1931年),第151页。《聘约式》,《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5期。

③ 徐世昌主张优给薪俸,“重禄劝士,图治之本,现既议改立新制,分设厅司,自应宽给廉费”。《东三省督抚奏定职司官制章程》续,《盛京时报》(奉天)1907年5月30日,第2版。

④ 《奉天巡警、卫生及警务学堂三处支款不敷由》(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号JB14-268。

⑤ 奉天盛京医院院长英国医生克里斯蒂认为:“人们对西医的信任正在逐步增长,中国西医人才的需求量相当大。……另外,在民政和军政领域内,也逐渐需要卫生方面的官员。”[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⑥ “查北洋医学堂学生毕业派差向均月支薪60两。”《译派保定医院医官》(宣统三年六月十四日),《北洋官报》第2865册,第9页。

⑦ 《遵协会议拟将卫生、兽医两学堂改办军医局暨附设高等军医学堂、兽医研究所请坐办文》,《南洋军事杂志》1909年第40期。

⑧ 《钟文邦派赴美国军医会并拨给薪水等银已飭令启行由》(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档号01-27-015-01-080。

⑨ 时人报道英国医生年收入在1.5万—20万元之间,但由于未说明货币单位,难于做出确切比较。《英国医生之收入》,《学报》1908年第9期。

⑩ 上海市档案馆藏:《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页。

⑪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中译本),第193页。

⑫ 文中银两与银元的比价根据《巡警总局常年经费各项预算表》中1:1.538计算。徐世昌编纂:《东三省政略》(上),第942页。《各国铁路员役月计薪价比较表》,曾鲲化著:《中国铁路现势通论》(下),上海:化华铁路学社1908年版,第64—65页。

支付与之相配的薪津。

最后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在东北糟糕的财政状况下,<sup>①</sup>官聘西医的经费从何而来呢?换言之,政府到底是如何解决新政所带来的财政难题的呢?最初,东北地方官试图动用正款办理警察事务,未能得到户部的批准,只得由地方商会承担起筹措卫生经费之责。光绪三十二年,赵尔巽以如下两条理由向户部请示动用正款办理警察事务:一是警务学堂及警察卫生诸事皆为新政,为免日本干涉,“必不可缓之图”;二是奉省迭经兵灾,地方凋敝,物价高昂,车价、工价数倍,官薪、兵饷又难议减,警察局及警察学堂、卫生所每月额支、活支各款不下3万两之谱,以收铺捐、灯膏、灯捐等款计之,入不敷出。户部回复认为,奉天警务章程悉照直隶章程办理,每月应支银4200余两,“断不及三万两之巨”,因此令其“所有应支一切经费仍令在于铺捐、灯膏等款项下动支,不得动及正款”。<sup>②</sup>对此,《东三省政略》记载道:“若巡警、卫生、工程、交通、慈善及一切地方行政,则应取诸地方税,如亩捐、牛马税、房铺捐、营业税之属是也。”<sup>③</sup>

然而,公文往往记载的都是应然而非实然,若要了解具体运作情况,还需要从社会新闻中去发现官府与地方社会是如何化解财政难题的。一则报纸的报道表明,奉天的卫生经费并非源自地方税,而是由商会代为筹集缴纳。自光绪三十一年起,奉天卫生局的经费完全由商会筹集,“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诚属公益之善举”,议定城关各商户每月共凑缴银元11000元(合银7152两),按月解交。光绪三十三年,卫生局试图自行筹办,以办理新政为由加捐,引起众商户集体反对。<sup>④</sup>虽然缺乏更多细节资料,但大致可推断出卫生局的经费并未从地方税捐收入中拨付,而是由商会代为征收缴纳。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虽然清末新政未能得到支持此项改革的财政制度的保证,<sup>⑤</sup>但是地方社会往往会产生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新政措施的推行。从奉天的情况来看,地方社会以公益善举筹资的方式取代了地方税的开征,客观上使高薪官聘西医成为可能。

### 三、官聘西医办理防疫

宣统二年九十月间,东北爆发鼠疫,大量人员患疫死亡,引起各界恐慌,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sup>⑥</sup>一时之间,防疫成为东北官府的头等大事,急聘中外西医到东北办理防疫成为东三省总督的当务之急,因此留下了大量官聘西医的往来电函。基于此类资料,附之以报刊记载,本部分将着重分析东北防疫过程中官聘西医的薪津状况。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哈尔滨发现第一例鼠疫患者,议事会决定溢价临时聘请医生进行防疫。由于防疫有感染身亡的风险,临时聘请医生的月薪为450卢布(约合310两),是平时的1.5倍。<sup>⑦</sup>除

① “奉省常年入款统计不下五百八十余万,而出款已达九百四十余万,吉省常年入款统计不下二百八十万,而出款已达至四百五十余万,江省常年入款统计不下九十余万,而出款将及二百万,通盘合算三省每年出入实数不敷约七百万两。”《三省财政大概情形》,《盛京时报》(奉天)宣统元年七月十八日,第5版。

② 《户部咨开奉天巡警、警察卫生所支各款仍在铺捐、灯膏等款动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档号JB14-268。

③ 徐世昌等编撰:《东三省政略》(下),第1087页。

④ 《奉天商会抵抗卫生局》,《盛京时报》(奉天)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第5版。

⑤ 日本学者岩井茂树认为:“清末积极推行的地方行政的近代化措施,却没有确立支持此项改革地方财政制度加以保证。”[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5页。

⑥ 东北大鼠疫是近代中国医疗史上的大事件,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已有大量学术成果问世。不过,清政府官聘西医参与防疫的具体情况尚未受到学者关注。参见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吴俊莹《从东三省鼠疫问题看清末的内政与外交(1910—1911)》,《国史馆馆刊》2009年第20期;Mar Gamasa,“The Epidemics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Past and Present*, No. 190 (Feb. 2006); William C. Summers,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⑦ 疫情平息后,医士月薪恢复正常,减至300卢布(约合227两)。《哈埠医员之会议》,《远东报》(哈尔滨)宣统三年四月初六日,第2版。

付给较高薪水外,还必须为医生购买 10 000 卢布(约合 6 896 两)的保险费。<sup>①</sup>从十一月初一日起,该会先后雇佣 6 名医士和 10 名医学生,每月支薪 6 000 卢布(约合 4 140 两)。<sup>②</sup>

此后不久,哈尔滨疫情加重,引起各国关注,强大外交压力迫使清政府全力防疫,准许东三省聘请医生,“所需款项,应请筹备,俟事竣核实报销”。<sup>③</sup>按照清政府的财政制度,这一命令意味着东三省总督得到授权,可以根据需要支付费用,无需报请中央。因此,锡良开始四处张罗聘用西医到东北防疫。由于东北地区缺乏足够的西医,<sup>④</sup>锡良不得不分别致电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和兼署两广总督张鸣岐,请其在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城市代为聘请。首先,他致电陈夔龙,请其派遣医务人员前往哈尔滨。接到电报后,陈夔龙选派“通晓西医,确有经验”的医官 3 人,<sup>⑤</sup>以及医学堂毕业生 3 名,到东北防疫。疫情加剧后,北洋军医学堂又加派医官 2 名和医学生 20 人前往哈尔滨办理防疫。<sup>⑥</sup>根据最初的约定,医官每人月薪 300 两,医生每人月薪 120 两。<sup>⑦</sup>由于哈尔滨疫盛之时,法国医生和医学生先后患疫身亡,伍连德等人上报辞职。吉林巡抚陈昭常不得不重薪留人,重定医生月薪为:伍连德 500 两,正医官 300 两,医生 220 两,学生 100 两。如因疫而死,医官恤银 10 000 两,医生 5 000 两。<sup>⑧</sup>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锡良电请张人骏飭上海道,“就近选派防疫素有经验之员五六员”到奉,另请聘定英国医生 1 员。<sup>⑨</sup>上海道台代为聘定“曾在医院检疫,极有经验”的两位医生,月薪 260 两,川资各 100 两,随带药学生 1 名,月薪、川资各 25 两前往东北防疫。<sup>⑩</sup>上海仅聘到医生 2 名、司药 1 人,锡良深感不敷分布,请求多派十数名速往。<sup>⑪</sup>可惜的是,上海附近医生“为自顾性命起见,愿往者甚少”,虽“遍登广告延聘,应者迄尚无人”。<sup>⑫</sup>这种状况似也表明,二三百两的月薪对于上海地区的医生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至于外国医生,一则其索薪过巨,二则担心其“恐争揽大权,致在事人员或生意见”,故未聘定。<sup>⑬</sup>江海关税务司曾觅得英国医生巴地利格,不过他提出了天价合同,要求:“一、合同须由中国官签押领事特递;二、合同 3 月为期,从上海起程日起;三、薪水每月 1 500 两,旅费寓费医贴在外;四、合同满后展期不得过 1 月,薪水及各费照前一律;五、合同期内应向英国人取保险公司保银 3 万两。”<sup>⑭</sup>无论是薪水还是保银都是通常聘请医生价格的数倍,此种漫天要价吓退了东北官员。

在上海仅聘定 2 名医生和 1 名司药后,锡良只好致电张鸣岐,“现望医如望岁,贵省华生学西医者甚众,乞遣派十数员即日航海来奉”。<sup>⑮</sup>张鸣岐在广东四处罗致愿赴东北的西医,后觅得中国医生

① 文中海关两与卢布的比价按照 1:1.45 计算。参照《六十年来海关两与各国货币比价表》,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51 页;《医治瘟疫者之薪金》,《远东报》(哈尔滨)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第 2 版。

② 《会议防疫问题》,《远东报》(哈尔滨)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第 1 版。

③ 《通致吉林两省电》(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5。

④ 吉林巡抚陈昭常在给锡良的电文中指出,吉林只有 3 名西医,“实不敷用”。《陈简帅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5。另据报载,“方今疫症流行方今疫症流行全省殆遍,本省(吉林)西医仅三四人,实在不敷应用”。程崇实:《防疫意见书》,《吉长日报》(长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第 1 张第 3 版。

⑤ 分别是候选通判全绍卿、候补知县司徒宗元和候补知县黎树荣,《天津陈筱帅来电》(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⑥ 《天津陈筱帅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⑦ 《天津陈筱帅来电》(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⑧ 《致外部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46。

⑨ 《致南京张安帅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⑩ 《南京张安帅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⑪ 《致南京张安帅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⑫ 《南京张安帅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⑬ 《致南京张安帅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⑭ 《南京张安帅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⑮ 《致广东张坚帅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8。

9名和外国医生1名,①签订聘任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医生月薪按照北洋医官标准,每人月薪250两,另加宿膳费50两,共计300两;②每人川资400两;合同期至少4个月;医生因公病故,给恤银薪水6个月(1500两)。③

外务部亦在北京为东北聘请旅华教会医士。当时英国大使馆的德国医官致函外务部表示,“旅华教会医士品格高尚,谙习华语者甚多,如给月薪300两,恤款1万两,一经邀请必尽义务”。④外务部将此消息电告锡良,锡良马上表示延聘6人,月薪300两。⑤外部表示“惟饮食、车马,似应与哈尔滨一律”。⑥锡良认为,东省延聘的洋员都不供给饮食和车马,为免歧异,提出将薪水改为350两。⑦

除总督出面在全国雇佣中外西医外,东北各地还聘请了20名左右的日本医生。⑧疫情之初,锡良即咨请满铁总裁和日本总领事,托其代聘“谙练鼠疫之日医,以充防疫事务所医官”,经推荐聘请7名日医在奉天办理防疫。⑨有的地方官就近与日本领事交涉,委托其代为聘请日本医生担任医官。有的地方官遵照日本领事要求,聘请日本医生出任医官。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委托日本领事代聘日本医生,选定爱知县技师稻垣刀利太郎和原高知县检疫官村松六助两人前往黑龙江办理防疫事务。遵照奉省先例,双方订定合同6条,规定:每员每月薪金日洋450元(约合银340两),川资日洋400元(约合银300两),合同期限3个月,如因执务死亡时,加给薪金10个月(约银3400两)。⑩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驻新民府日本副领事北条的要求下,新民知府张翼廷延聘日本医士守川氏出任防疫医官,“该医半尽义务,月送小洋100元”。⑪长春拟聘请的日本医师,议定每月薪金300两,若殉职赐恤金1万两。⑫

除奉天、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外,铁路附属地邻近的府县,以及开放口岸商埠城市,基本只聘请从国内外医学堂毕业或肄业的西医出任警察局卫生官员和官立医院的医生。营口防疫医院院长暨警务局卫生股员郭钟韶,为医科举人、学部司务,毕业于日本熊本医学专门学校,复于东京传染病研究所毕业,历任北洋医学堂教习、营口防疫院医官。营口防疫医院医官邓松年,医官通判职衔,毕业于北洋高等官医学堂,历任民政部官医院头等医官、营口施医院医官。⑬凤凰厅聘用的杨富荣,原系吉川医院牲技师,学习有年,考有日本军医证书。⑭锦州防疫局医官王玉麟毕业于奉天基督教公立医学堂,乔宝龄毕业于营口普济医院,女医士张守道、张进忠均在锦州英国施医院肄业。⑮

#### 四、官聘西医的评定标准

在防疫过程中,官聘西医订立的合同中必须有抚恤银一项。为了评定恤银的金额标准,官府发

① 当时有3名外国医生应聘,锡良担心“事权不一,转生意见”,故而提出“此来西人以能中语为好”。因此,最后仅聘请外国医生1名,颇谙粤语,且中国医生能为之翻译。《致广东张坚帅电》(宣统三年正月初九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18。

② 因“宿膳费由公家开支,难以预计”,最后议定每员月给薪水300两,宿膳自理。《致广东张坚帅电》(宣统三年正月初九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18。

③ 《广东张坚帅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18。

④ 《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一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46。

⑤ 《致外部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46。

⑥ 《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三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46。

⑦ 《致外部电》(宣统三年正月十四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46。

⑧ 日本北里柴三郎博士曾道,“目下中国雇佣之日本医师共有20人”。《北里博士之黑疫视察谈》,《吉长日报》(长春)宣统三年二月十九日,第1张第3版。

⑨ 《督帅延聘日医从事防疫》,《盛京时报》(奉天)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5版。

⑩ 《致周朴帅电》(宣统三年正月初二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23。

⑪ 《饬新民张守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26。

⑫ 《请看日人生命之代价》,《长春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5版。

⑬ 《营口周道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26。

⑭ 《凤凰朱丞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一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26。

⑮ 《锦州豫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一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26。

现自己必须有一套标准对聘请的西医进行资格认证,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为此,各个衙门围绕着如何确定恤银的标准展开了激烈讨论,并进而确定了聘用西医的标准。本部分将通过分析当时对恤银标准的讨论,来了解官聘西医的评定标准。

虽然聘用合同已有恤银条款,但到底应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形式进行支付并无定论,仍需各衙门之间进行商议。外务部、东三省总督和吉林巡抚就恤银发放的标准展开了反复讨论。最初,吉林巡抚以“非优加抚恤,不足以资激励”为由,提出医官给恤方案,拟定医官恤银1万两,学生5000两。外务部则指出该方案存在3点不足之处:一是降低恤银数目可能造成办事不力;二是各官员恤款等级不宜优于医官;三是应对医官进行优待。<sup>①</sup>

锡良不同意外务部的意见,认为“医员程度不同,担任之事有难易安危之别,有奋不顾身奔驰救护者,即有敷衍从事,退缩不前者”,因此应区别对待。他更从实际状况出发,说明了为何恤银必须分等。在东北防疫中,由于各地缺少西医,官府不得不依靠中医进行防疫,“此类中医各州县无虑千数百人,明知其不可恃,不能不听其沿用,以顺民情”。这些未经学堂训练的中医不信消毒保卫之法,“不特易涉危险,涉疑似者不免因医生而受传染”,故此类医生死亡最多,“若以一万、五千为比例,断乎难以为继”。此外,锡良指出,在防疫过程中,“办事一切手续皆赖地方官竭力相助,不可偏废,不职者处以严参,死事者难邀优恤,揆揆事理岂可云?”故而地方官恤银应优于医官。<sup>②</sup>经磋商后,锡良拟定防疫人员、医官给恤等级清单上报军机处,获准执行。<sup>③</sup>

在锡良等官员看来,各级地方官作为防疫人员参与防疫,也应与医生一样享受恤银保障。因此各级官吏比照医官等级有相对应的恤银标准,这也可反映出当时医生在官僚等级制中处于一种较为尊崇的地位。参见表1。

表1 医官与地方官恤银比对照表 单位:两

防疫官员等级	官员等级	医官等级	恤银
一等防疫人员	二、三、四品现任人员	一等防疫医官	7 000—10 000
二等防疫人员	四等候补、候选人员	二等防疫医官	4 000—7 000
三等防疫人员	五、六、七品现任人员	三等防疫医官	2 000—4 000
四等防疫人员	五品以下候补、候选人员,八品以下现任人员,以及派充重要差使人员	四等防疫医官	200—2 000
五等防疫人员	警员、夫役人等		比照军营阵亡例从优给予

资料来源:《致军机处》(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46。

锡良将聘请出任医官的医生按照所获学位的不同划分为4个等级,每等有不同的恤银标准,详见表2。透过表2中所列举的资格条件,可以了解到锡良、陈昭常这些长于官场规则的官员们是如何对医生进行等级划分的。首先,基于官本位思想,他们将聘请的医生视为医官,对其的基本要求是接受过西式医学堂的正规教育。在防疫过程中,东北各级官府几乎只聘用此类医生出任防疫官员。《远东报》对此评论道:“自东省黑疫发现后,国家不惜重金征求新派之医士,且令各地方官悉听其号令,其尊崇之礼,可谓至矣。”<sup>④</sup>其次,医官的等级划分不仅跟学位有关,而且跟年资相关。医生的等级严格根据其学位高低和接受教育国别评定:外国医学堂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为第一等,外国医学堂毕业的医生视为第二等,国内医学堂毕业的医生为第三等,国内医学堂尚未毕业的学生为第四等。此规定既反映了官员们划分医生等级的标准(与经济待遇密切相连),也显示出官府对中、西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只聘请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西医担任医官,领导管理防疫事务。虽然东

① 《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初九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46。

② 《致外部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374-46。

③ 《宣统政纪》卷4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851页。

④ 《警告中国新派医士》,《远东报》(哈尔滨)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第2版。

北地方由于缺乏西医,不得不聘用中医防疫,但不会任用其出任医官,更不会按照西医的标准支付薪津和恤银。

表 2 防疫医官等级、资格及恤银表 单位:两

	资格	同例	恤银
一等防疫医官	具有外国医学博士学位的外国人和中国人	毕业后在官设机关办事满 10 年的二等防疫医官	7 000—10 000
二等防疫医官	外国大学高等专门医学堂毕业,所得学位非博士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毕业后在官设机关办事满 10 年的三等防疫医官	4 000—7 000
三等防疫医官	中国人在本国境内外国所设医学堂及本国西医学堂 3 年以上毕业者。		2 000—4 000
四等防疫医官	中国人在本国所设西医学堂未毕业学生。		200—2 000

资料来源:《致军机处》(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46。

清政府确定的恤银标准与此前合同约定的金额有一定的出入,从一些个案可知恤银基本按照此标准执行。<sup>①</sup> 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亚瑟·杰克逊医生,在京奉铁路车站一带检疫,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染疫歿,锡良送给其母亲 1 万美元(约 1.51 万两)抚恤金。<sup>②</sup> 新民府日本医生守川歿显履职不足 10 日,即因疫毙命,数日后其妻相继病故。锡良将恤银万元交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由其转交家属。<sup>③</sup> 与厚待洋医不同,中国医生和防疫人员的恤银有限。宾州死亡医生 2 名,救急队长 2 名,照四等各给恤银 200 两,队警、看护夫 16 名,照五等各给恤银 30 两。<sup>④</sup> 新民府有两位看护因公患疫身亡,每人发给恤赏银 100 两。<sup>⑤</sup> 时人在报纸上对此感叹道:“呜呼!日人之生命其代价固如是其重且大耶,吾国人何如?”<sup>⑥</sup>

概而言之,虽然官聘西医合同中约定了恤银的金额,但官府为了便于操作最后议定恤银等级表,不仅将地方官员也纳入到抚恤范围,而且确定了各等级的具体金额。更难得的是,恤银等级表还反映出官府聘用医生担任防疫医官的资格评定标准:只有接受过中外医学堂教育的西医才有资格出任防疫医官;在医学堂取得的不同学位则是具体出任某一等级防疫医官的评定标准。

## 五、余论

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官府不仅聘请中外西医在卫生局和官立医院任职,主持卫生行政事务,而且聘请西医出任防疫医官,办理防疫事务。官聘西医必须按照市场价格支付高薪,签订雇佣合同,其来源有二:一是北洋医学堂培养的所谓体制内人才,具有一定的官衔,以医官身份出任相应职务;一是市场上聘请的执业医师,以日本医生居多。随着需求的增加,为弥补西医之不足,东北地方官府大多聘请价廉且量多的日本医生出任医官。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较之欧美医生昂贵的薪水,聘请日本医生的费用与中国医生相差无几,月薪一般为 200 两左右,较为合算。从量的角度来看,由于日本人积极经营南满铁路公司,有相当数量的医生前来为当地日本人提供医疗服务,加之随军军医亦不少,便于中国官府就地聘请。例如,凤凰厅未能聘到合适的西医,借用日本陆军一等

① 如病故的交涉司练习生毓琛恤银为 1 000 两,医生王芝臣和张墨林的恤银为 2 000 两。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译,吴秀明、高岚点校:《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 12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197 页。

② 文中银两与美元的比价按照 1:0.66 计算。参照《六十年来海关两与各国货币比价表》,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51 页;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中译本),第 203—204 页。

③ 《新民张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初三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26。

④ 《宾州许守来电》(宣统三年三月初四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5。

⑤ 《饬新民张守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26。

⑥ 《请看日人生命之代价》,《长春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5 版。

军医稻田谨一郎、川口恒造 2 人,满铁会社医员解田英之、五上秀吉、山本茂 3 人帮诊。<sup>①</sup>

此外,官聘西医有年的地方,地方官对聘用西医已形成一些经验性知识。营口先后聘请英国医生、俄国医生和日本医生参与该地的卫生防疫,因此在选择医官过程中营口道台周长龄表现得相当有经验。在究竟是聘请英国医生还是日本医生的问题上,他认为:“添聘英医费太巨,添日医两不相容。”<sup>②</sup>当时有英国医生表示愿意前往营口办理海港检疫,且要价不高,月薪关平 350 两。<sup>③</sup>不过,周长龄并未雇用该医,只因“恐日人无理挑剔,反觉多事,拟改用日医,图省口舌”。<sup>④</sup>这也反映出日本人的飞扬跋扈,地方官宁可不作为也不愿多生事端。此外,在如何识别聘用医生的资历方面,周长龄也显示出一定的鉴别力,并非来者不拒。为办理检疫,他与伍连德商议派遣华医到营口。因无医可派,伍连德提议聘请广东军医李植臣、祁祖荫、陆锡蕃 3 人,但表示“该医等系军医毕业,学问未必甚深”。<sup>⑤</sup>周长龄对此论表示认同,且言“又不知有无经验。恐非所宜”,故未予聘任。<sup>⑥</sup>

总体而言,东北官聘西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不仅反映出清末新政改革中政府开始聘用西医办理卫生行政,而且体现了在列强强权压力下东北官府任用西医办理防疫的态度。由于供不应求,官聘西医必须按照市场价格开出高于同级官员的薪津。也就是说,医生进入官僚体制,与其他技术人才一样,需按照专业人士的标准支付工资。不过,虽然聘用西医费用很高,但督抚一级基本只任用西医办理卫生防疫,铁路沿线有附属地的府县以及开放商埠基本也都聘请西医办理卫生事务,而在较为边远的地方难以做到。因此,笔者认为,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实际体现了清末政府对待卫生防疫事务所秉持的意旨,即遵照西方惯例办理中国的卫生行政。当然,在实行过程中出现很多水土不服的现象,不仅引起国人的反感,而且引起中国官员对西医的怀疑。然而,这些都不能改变主政者在卫生行政领域基本只任用接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生的策略,因此,官聘西医这一行为所具有的表象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当然,官聘西医并非是毫无标准的。清末,除了几所官办医学堂外,整个中国并无完善的西医培养体制,所谓西医不过是在外国教会办的医学堂或官医学堂接受过一定培训的医学生,实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因此,官府真正信任且愿意聘请的西医有两类,一类是在国外接受正规医学教育,并获得学位者,一类是北洋医学堂毕业生。前者拥有外国教育的凭信,可以保证其素质,后者则是由于北洋医学堂在中国西医教育中占据的地位,得到官方背书。

清末东北的官聘西医现象对中西医而言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官府高薪聘请出任医官的示范效应,西医成为一种既有高收入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职业,成为时人除就仕外谋求社会身份上升的另一通道。另一方面,官聘西医出任医官职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医很难得到官府认可出任卫生行政职位。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东北官聘西医是应对外来干涉和疫情威胁的产物,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不能以偏概全地说明其他地方的情况。此外,这一历史现象体现的是国家任用何者出任卫生行政职位和医官的态度,而不是对待中西医学的态度。惟其如此,才能理解国家虽任用西医办理卫生行政,但距离西医在医疗卫生事务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仍有漫长的路程。

① 《凤凰朱丞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一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26。

② 《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15。

③ 《饬营口周道电》(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26。

④ 《营口周道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26。

⑤ 《饬营口周道电》(宣统三年二月初十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26。

⑥ 《营口周道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档号甲 374-26。

## The Official Employment of Western Doctor and Their Salary in the Northeast China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Du Lihong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geopolitics and epidemics, the Northeast China had been in the frontier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 British doctor had been hired in the 1870 and the western doctors had been hir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Health Bureau in Newchuang in 1899. On the basis of related archiv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at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official employment of Western doctor was the oppression of the foreign powers. The Northeast local authorities hadn't hired the western doctors with high salary to fill in the new positions of the health bureau and official hospital until the Reform of the Official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Plague, the local authorities had hired the Japanese doctors, except the doctors from Tianjin, Shanghai, Guangdong, and Beijing, to take part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These doctors had not only received high wages, but agreed on high pension. So the Officers had to set standard of the pension, which reflected the standard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western doctor.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official employment of Western doctor had been a normality, which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Key Words:** Official Employment of Western Doctor; Salary; Standard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Western Doctor

(责任编辑:高超群)

### 《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出版

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国信教授的《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一书于2018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市场的形成一直是经济学市场理论的重要命题,本书利用私盐贸易形成路径的经验事实,挑战了由分工、价格自发形成市场的古典经济学论断,是一部有思考性的著作。

全书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波兰尼等人的理论中关于市场形成的见解,提出深入研究波兰尼引而未发的“市场嵌入社会”理论对讨论市场形成的学理启发。第二部分从可以被看作探讨传统中国市场形成问题的最佳实验地的清代私盐贸易出发,透过潘进与彭应燕、阮元与苏高华的两个精彩故事,讨论了“人类”如何“设计”了私盐贸易的秩序,揭示出清代私盐市场的形成,采用了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和干预的制度结构的路径和策略。第三部分在总结“网络与结构”路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传统文化体系在该路径下具体发挥作用所形成的“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正是传统中国“市场嵌入社会”的具体机制和表达。

全书深入浅出,回到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提出了一个基于具体经验事实基础上的理解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路径和策略及其路径依赖的理论框架。(李晓龙)